

第一章

東突厥斯坦穆斯林運動及莫斯科在 新疆影響力的加強 (1931–1934)

與伊朗阿塞拜疆地區及土耳其發生的事件相比，蘇聯開始對新疆表現出關注則要早得多。當地人口民族—族群構成與對穆斯林宗教的虔誠，以及維吾爾人與中亞地區諸民族的民族淵源，使東突厥斯坦地區大部分區域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就已成為蘇聯關注的目標。C·羅斯托夫斯基在三十年代中期根據共產國際提議進行的一次考察活動，曾指出東突厥斯坦地區的面積為142.5萬平方公里，達中國國土的三分之一（原文如此一譯者註）。他寫道：此區域面積接近伊朗疆域，比土耳其版圖大一倍，面積與法國、德國、英國三國領土之和相當。¹新疆與蘇聯接壤邊界超過1,000英里。²當時在中亞地區諸蘇聯加盟共和國生活着80萬至90萬維吾爾人，他們與新疆地區的維吾爾人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³自治運動前夕東突厥斯坦人口數量如何？其民族—族群結構又是怎樣？有關這些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數據。據蘇聯由多條新疆來源管道而得到的資料顯示，二戰前新疆生活着390萬人，其中250萬維吾爾人，23.5萬哈薩克人，23萬漢族人，20萬東幹人（東幹人是操漢語的穆斯林——作者），13萬滿族人，12萬柯爾克孜人，8.5萬土爾扈特人，其餘有察哈爾人、刀郎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印度人、俄羅斯人、藏族人及其他民族。⁴這些數據大致符合新疆督辦盛世才提交的1941年新疆人口數量的數據。兩者細微區別在於維吾爾人及哈薩克人的人

口數量。根據盛世才的數據，373萬新疆總人口之中，維吾爾人有298.4萬，哈薩克人有32.6萬人。⁵但在東突厥斯坦革命者烏馬爾·伊斯拉莫夫1934年為共產國際撰寫的呈文中則堅信這些數據沒有一個是正確的，並報告說：新疆生活着1,400萬至1,500萬人，其中70%是維吾爾人，7%是蒙古—卡爾梅克人，6%是東幹人，5%是漢人，4%是哈薩克人，4%是柯爾克孜人，而2%則為其他民族。⁶事實上，若比照當前東突厥斯坦地區人口數量，上述這些數據看起來更為真實可信。在新疆事件結束的1949年，毛澤東在其發言中指出在東突厥斯坦地區有900萬突厥穆斯林人口。顯然，穆斯林人口減少是與1944至1949年間新疆的反抗運動有關。至於這裏生活的漢人，在蘇聯專家撰寫的情報資料中則指明，漢人「不是新疆的原住民，而是一些來自中國內地以及因各種違反中國地主的法規行為從內地流放至此的人」。⁷

在新疆390萬人口之中，286.8萬人(72%)住在農村，48.7萬人(12.5%)棲身在城市，而60.45萬人(15.5%)則過着遊牧生活。⁸

蘇聯在1931至1934年間公開干涉東突厥斯坦發生的事件，時間上也正值穆斯林運動擴大之際。但在此之前新疆各個地方就已發生了反抗中國國民政府的起義活動，維吾爾人參與獨立鬥爭的活動當時就曾受到關注，如1912年哈密的托穆爾·哈利發、1915年吐魯番的阿赫邁德、1917年庫車的穆哈邁德·阿力汗、1923年喀什的薩利丁等。鑒於這些事件，為防止維吾爾知識分子叛亂，1928年獲任命為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金樹仁藉口布爾什維克黨威脅，開始拘捕這些人。他將大量漢族移民安置在這裏，允許他們利用維吾爾人為自己謀取利益。⁹

新一階段局勢的發端始於1931年初的一起家事衝突。1931年2月，一位保護漢族移民的漢族軍官意欲強娶哈密城名人薩利赫·達爾尕的女兒。這種做法被認為是羞辱穆斯林。達爾尕於是採取了一種策略性做法：同意他們結婚並邀請了約50名漢人出席婚禮，把這

些人灌醉後統統射殺。¹⁰事件成為哈密暴動的起因。4月份，不滿情緒業已席捲哈密地區其他居民點，而到5月份哈密城已被暴動民眾控制，暴動活動在極短時間內蔓延到穆斯林生活的各個區域。由維吾爾族首領和加·尼牙孜·阿吉及哈密前任參事堯樂博斯汗之孫堯樂博斯·卡孜領導的這場反對國民政府當局的運動，帶有民族解放性質。在打敗政府軍隊之後，和加·尼牙孜·阿吉被推舉為伊斯蘭軍總司令，各地暴動武裝也轉而接受他的指揮。¹¹在取得伊寧著名宗教人士沙比提大毛拉的同意後，哈密暴動開始由吐魯番的馬可蘇德、和田的穆哈邁德·伊敏·布格拉統率，當時有七個居民點同時起事。暴動民眾的主要口號是「建立穆斯林人民共和國」。1931年5月31日，維吾爾革命委員會及暴動軍隊頭目和加·尼牙孜，以新疆穆斯林人民的名義向當時正在進行反對中國國民政府制度活動的蒙古革命委員會發密函，請求軍事援助，毫不掩飾地闡述暴動的原因。他寫道：「我們穆斯林民眾已經向漢人繳納了數百年的稅，像狗、驢一樣為他們工作。最近一二十年來，漢人的壓迫更是加大了。（他們）不僅沒收我們的土地和財產，還到處任命那些搶掠我們糧食、木材等東西的官員，這讓我們深受折磨。所有這些我們一直都在忍受，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他們並未停止這些劫掠，又開始欺侮我們普通人家。我們穆斯林民眾不能再忍下去，決定與其就這樣死在他們手中，不如起來與他們鬥爭並消滅他們，如果真主相助的話，我們想成為自己的主人」。¹²為了與蒙古領導人建立關係，和加·尼牙孜派遣以伊斯馬伊爾阿訶、伊敏·庫爾馬爾、祖列特丁阿訶等人代表他前往蒙古。他在信中還講述了與吐魯番、喀什、和田及阿斯坦納（在吐魯番市東南——譯者註）等地穆斯林建立聯繫的情況，講述了喀什的土爾扈特人正在等待他們（蒙古人——譯者註）的到來。和加·尼牙孜強調：我們穆斯林民眾現在做的這件事不僅為自己，還為了所有受漢人剝削的人，我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獻身。¹³與和加·尼牙孜一起在這封信上簽名的還有其助手堯樂博

斯·卡孜、庫爾班·達爾嘎、薩利赫·達爾嘎、巴吉·尼牙孜·達爾嘎、薩迪克·庫爾馬爾及毛拉帖木兒·尼牙孜。

由於1928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統治還不穩固，各省的離心傾向此時日益增強。利用當前局勢實現自己目的的不僅有穆斯林，還有意圖鞏固自己實力及建立私人統治政權的各地政府。長期主政新疆（1912–1928）的楊增新於1928年7月7日遇害後，金樹仁獲任命為新疆省主席（督辦）（1928–1933）。儘管金樹仁曾任新疆政務廳廳長，但在東突厥斯坦地區相對而言還是個新人，因此他側重延續楊增新統治時期的政策方針，不願冒險改變新疆與蘇聯的關係。¹⁴不過，金樹仁卻徵收牲畜屠宰稅，並禁止穆斯林到實地朝覲。¹⁵當時，從1920年代後期開始，東突厥斯坦地區的穆斯林常常穿過蘇聯領土前往麥加朝覲。¹⁶喀什的英國總領事曾報告稱，許多中國漢人阻礙喀什穆斯林越過蘇聯領土前去朝覲。¹⁷曾任喀什道尹的馬紹武將軍，發現各省政權孱弱，早在穆斯林民眾暴動開始前就已與新疆的蘇聯外交官發展關係，請求他們幫助自己策動政變並將喀什變成一個獨立邊地。為換取軍事援助，馬紹武許諾將喀什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聲稱：「你們會在這裏得到日本人在滿洲所擁有的。」¹⁸但是，考慮到新疆是蘇聯工業的原料基地，蘇聯沿東突厥斯坦一線邊境維護困難，以及位於該地區的阿富汗、印度與中國因素等，駐新疆的蘇聯機構處理與馬紹武的關係時更偏向保持謹慎，拒絕向這位喀什行政長官提供軍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駐烏茲別克特派員M·斯拉烏茨基曾給副外交人民委員И·М·加拉罕這樣寫道：「這一時期馬及他這樣人物出現，實際上是一場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並不能改變新疆的社會制度。」¹⁹此外，蘇聯機構認為馬紹武及其親信是日本方面的間諜，而日本一直關注新疆的局勢。²⁰

哈密起義開始之後，在甘肅的回族首領馬仲英向和加·尼牙孜及其他維族領袖給予幫助並提出建議。儘管伊斯蘭軍隊司令部中有很多人對回民持懷疑態度並反對引入他們的幫助，但和加·尼牙孜

還是接受了馬仲英的建議。早在1928年，馬仲英就領導了甘肅的回民起義，以一系列果斷行動引起了各界關注。與起義軍聯合之後，馬仲英計劃利用這一有利局面來削弱並最終推翻金樹仁政權。帶着這些打算，他派出一支由1,000名騎手組成的騎兵部隊前去幫助哈密的起義軍。此時和加·尼牙孜的軍隊人數已達1,000人。²¹然而，當國民政府當局軍隊向起義軍進攻的時候，馬仲英的回族騎兵部隊在奪取政府軍一些武器為戰利品後卻回到甘肅。²²由於和加·尼牙孜與堯樂博斯·卡孜發生分歧，後者也帶着自己由170人組成的部隊和回民一起離開了戰場，導致起義軍的狀況變得極其困難。²³由和加·尼牙孜領導與中國政府軍進行殊死之戰的200人維族部隊，最後不得不向山區撤退，1930年代維吾爾起義的第一階段也就這樣結束了。²⁴

在東突厥斯坦起義剛開始的1931年，起義者曾寄望蘇聯的幫助。這種期望是出於蘇維埃政權從1917年起就一直是世界革命的宣導者，尤其是1920年代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心已從歐洲轉到了亞洲，但這些幻想在三十年代已經過時。雖說當時的莫斯科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理論上對民族解放革命活動還持讚賞態度，但實際上卻是從蘇聯利益的角度去解讀這些活動，並以此來評價旨在反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暴動。儘管起義者代表向喀什蘇聯領事館提出要求購買武器，但卻遭到拒絕。甚至連蘇共中亞局書記К·Я·鮑曼就突厥斯坦蘇聯維吾爾族共產黨員在新疆起義民眾中開展工作提出建議，也從政治局議事日程中取消，而且一直沒有被審議。²⁵在如何看待新疆起義這個問題上，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與蘇聯領導人的觀點存在重大分歧。關於東突厥斯坦地區，對蘇聯來說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因素。在1930年代初，蘇聯佔新疆對外貿易額的80%以及出口量的90%。²⁶1931年10月1日，雙方在烏魯木齊簽署了《新疆省政府與蘇聯經濟關係協議》(即《新蘇臨時通商協定》——譯者註)，協議規定要加強與蘇聯的經濟聯繫。²⁷

蘇聯領導人認為在東突厥斯坦的國民政府當局被推翻後，英國和日本的特工機關可能會利用新疆地區來反對蘇聯，箇中原因首先是因為英國、日本、土耳其以及一些穆斯林國家對維族人起義抱以同情態度。當時英國駐新疆領事M·湯普森在1931年給外交大臣約翰·西蒙撰寫的報告曾指出：「穆斯林起義是由蘇聯挑唆起來的。」²⁸ 而由莫斯科獲得的一些情報顯示：新疆起義勝利後，似乎要借助日本幫助成立「圖蘭帝國」，把新疆、蒙古、幾個中亞蘇維埃加盟共和國及哈薩克斯坦包括在內。據推測，該計劃來自打入回族領袖馬仲英內部親信的幾名日本間諜。²⁹ 這些傳聞是合乎情理的，因為「被預言要在新疆登上王位的土耳其蘇丹後裔阿卜杜·克里木當時就在日本，而且日本還發行鼓吹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來並在那裏建立伊斯蘭國的泛突厥主義報紙」。³⁰ 考慮到這些情況，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人員認為蘇聯向新疆開始的這場穆斯林運動提供保護並不適宜。一些蘇聯同事經常問自己這樣的問題——「這場運動是什麼性質？是反動的還是革命的？」在中亞的蘇聯工作人員認為，「這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但卻沒有提到土地問題；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但卻沒有反帝國主義鬥爭，也沒有與蘇聯結盟的目標。」³¹ 不過，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及其駐中亞的代表則建議對東突厥斯坦開始的這場穆斯林運動提供保護。共產國際駐塔什干代表Д·Я·多爾夫就向東方書記處通報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論據歪曲了事情的真相，並有意對運動作出不正確的評價。」³² 聯共(布)中亞局負責人將新疆開始的這場起義定性為民族解放運動，而同處該地區的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軍人和工作人員，在論證這些事件革命性質的同時，還認為在鎮壓起義問題上不應該向新疆中國政府提供協助。1931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起草的一份參考資料，建議И·皮亞特尼茨基不要向金樹仁政權提供協助及出售武器。³³ 1931年夏，新疆政府請求蘇聯出售武器裝備及航空設備，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撰寫的建議書就指出：「此次起義應結合甘肅、

陝西、雲南等中國其他省份發生的穆斯林民族解放運動去研究。運動首腦是一些地主的事實，根本改變不了其民族解放的性質。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去特別關注新疆發生的事情。在任何情況下，新疆典型的軍閥反動政府無疑都會加強反蘇工作，都會存在各種新的破壞活動、反革命行為以及企圖削弱與蘇聯關係傾向的威脅，而我方軍事援助僅僅只是暫時延緩而已。用我們的武器鎮壓維族人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隨後實施的血腥恐怖，不可能不給民族解放運動帶來損失，而且基本上還會推動各種反革命力量的進一步團結與新疆反蘇基地的擴大。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因此認為，向新疆政府提供幫助以鎮壓維吾爾人起義是不適合的。」³⁴然而，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建議到達之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已於1931年8月5日根據И·М·加拉罕的指示批准了關於「接受外交人民委員會關於向新疆出售兩架飛機的建議」的決定。³⁵蘇聯政府的這一動作結束了有關對新疆事件態度問題上的各種質疑，並在反對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問題上向中國新疆政府機構給予了支持。而且政治局在1932年通過的四個決定又再充實了這一方針。1932年4月8日，在討論了新疆問題之後，政治局責成И·М·加拉罕並向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及И·阿庫羅夫建議：「要商定派遣10至15架飛機，以加強中國西部邊防機動聯隊以及從飛機上用機關槍射殺匪幫的指令問題。」³⁶這裏的「匪幫」所指的就是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回等各族起義軍，他們在督辦金樹仁武裝力量的猛攻之下已向北方及蘇聯邊境附近山區撤退。同年5月23日，政治局再次研究了新疆問題，責令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所轄的國家政保衛總局第一副局長亨里希·雅戈達，「全面徹底解決1932年4月8日政治局決議的落實問題。」³⁷1932年6月，政治局三次把向新疆政府出售武器問題付諸討論。6月16日，政治局在討論了羅加諾夫斯基提交的報告之後，馬上責令伏羅希洛夫及阿庫羅夫去辦理。³⁸同一天，政治局還研究了「按照與新疆合同進行供貨」的問題，並通

過了一份決議。決議寫道：「必須履行所簽合同。」³⁹6月22日，蘇聯政府最終完全公開了自己向新疆出售武器的意圖，而政治局也因為向新疆政府出售總金額達200,705美元的八架飛機、航空炸彈、子彈、汽油以及其他軍用器材的活動已在進行，而且新疆政府已向帳戶支付了價值2,070美元的金錠（此外，要轉交給我們的、價值46,680美元的金錠也已運抵邊境）來確認本次交易，因此通過了那份秘密決議。⁴⁰蘇聯政治局上述所有就新疆作出的決議都是絕密的，甚至在蘇聯解體後也還一直以「特別卷宗」方式保存着。

蘇聯出售的武器被新疆中國政府用來對付起義軍。為鎮壓維吾爾人起義，中國政府同時還運用了在新疆生活的白俄及哥薩克僑民。蘇聯偵察機構資料顯示，儘管該地區駐有2.5萬人的中國軍隊，但「人數達1,000人的白衛軍部隊最有戰鬥力」。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在為蘇聯領導人起草的情報這樣寫道：「但這唯一一支有戰鬥力的隊伍在關鍵時刻卻會背叛金樹仁，因為他們知道穆斯林憎恨他們，而且也擔憂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⁴¹在情報末尾別爾津提醒道：「起義運動進一步發展可能會消滅新疆中國政權並企圖建立起一個穆斯林國家。」⁴²

不過金樹仁卻借助中國政府能動員的各路武裝力量成功地將起義暫時鎮壓下去。起義軍也分成幾支小股撤退到山區，並在整個1932年期間不斷發動局部出擊，以此來癱瘓中國行政當局的工作，對新疆的中國軍隊進行突然打擊，但自己也遭受了重大損失。1932年12月新一階段的維吾爾運動在哈密地區開始，並於短時間內遍及吐魯番綠洲地區，再由此向阿克蘇一帶蔓延。此時的穆斯林，在聯合了鄰近地區的反對武裝和當地民眾之後，已能建立起一支由3,000名士兵組成的軍隊。穆斯林武裝在高昌打敗了政府部隊，這對其獲取武器發揮了巨大作用。起義軍在奪取中國政府軍隊的武器作為戰利品之後退回到吐魯番，而當時防守吐魯番的就有1,000名維族士兵。⁴³

1933年2月20日,「維吾爾民族革命委員會」成員為了取得起義勝利決定成立自己的政府。墨玉伊斯蘭法院法官穆哈邁德·尼牙孜·阿拉姆被任命為國家元首,沙比提大毛拉為總理,穆哈邁德·伊敏·布格拉為總司令。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接受了良好教育,是有智慧的人,熟悉政治事務。起義前他穿越俄國領土到麥加朝覲,回國途經印度。在喀什西北部(原文如此,應為西南部——譯者註)的和田組建委員會後,他開始大力推動發展獨立思想。⁴⁴

1933年2月21日,回民在烏魯木齊發動起義,22日攻陷墨玉,2月28日進攻和田也以勝利告終。3月份,起義已席捲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等地。3月底,喀什地區及首府烏魯木齊地區的大部分已落入起義軍手中。與此同時,烏斯滿統率一支由500名柯爾克孜人組成的隊伍也在阿勒泰地區起義。該部隊人數很快達到千人,於是他們就開始攻擊阿勒泰地區首府所在地承化縣城。⁴⁵新疆的中國政府軍隊此時已處於癱瘓狀態。1933年2月至3月間,烏魯木齊周邊100公里以及該城本身已處於接近前線的地帶,其中就連督辦金樹仁的保衛工作也只能完全寄望於前不久剛組建起來的白衛軍部隊。然而,就在4月12日傍晚,由於巴維爾·巴品古特男爵、別克傑耶夫上校及統率前新疆白衛軍武裝的軍官發動政變,督辦金樹仁在頑強抵抗之後被迫逃亡,而這時接手新疆政權的則是政府軍指揮官盛世才。⁴⁶至於蘇聯當局有否直接介入這場政變,目前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說法。⁴⁷對於擔心東突厥斯坦政權落入穆斯林手中的莫斯科來說,這種做法是有可能的。1932年底起,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開始為東突厥斯坦地區培養布爾什維克幹部,主要目的就是要讓那些與莫斯科有密切關係的維吾爾族幹部「清除泛伊斯蘭主義及泛突厥主義思想」。但當維族起義發生時,這些幹部還沒有培養好,而且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認為是國際帝國主義派到共產主義大學的間諜。⁴⁸

新疆白俄擁護成立由曾任新疆省政府教育廳廳長並曾在金樹仁政府擔任不同職務的劉文龍為首的中國政府。但同時,他們也致函

與穆斯林起義軍作戰的盛世才將軍，聲稱如果他想接掌新疆政權，白俄將會支持他。⁴⁹ 盛世才知道這是決定性的時刻，於是緊急派代表接洽維族軍領袖，提議他們如果放下武器，就將天山以南地區的管理權交給他們，而天山以北地區則由中國政府控制。然而，「南方的維族人卻反對這個建議」。⁵⁰ 4月12日，新政府發布了成立的消息。新政府在號召書闡述了省長金樹仁在1928年攫取政權的經過，細數了他的罪行。國民黨新疆委員會在其1933年4月28日的呼籲書也為新政府辯護。⁵¹ 不過，政權在形式上雖由劉文龍負責，卻由盛世才將軍掌握實際權力。根據新政府首腦的命令，盛世才獲任命為新疆境內所有中國軍隊的司令。⁵² 從1930年秋開始盛世才就在新疆任職。1931年7月，他被任命為新疆東路軍總司令，並直接指揮了針對和加·尼牙孜領導的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民眾民族解放運動的軍事行動。⁵³ 1932年8月，盛世才致信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及對新疆未來的看法。⁵⁴ 他千方百計地渴望蘇聯領導人能注意自己。他寫道：「1923至1927年我在日本學習，不斷地鑽研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作品，因為學習了這些著作，我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擁護者。」⁵⁵

盛世才借助白衛軍的幫助在吐魯番與鄯善成功實施一系列行動之後，得到了「常勝將軍」的綽號。但新疆流行着傳言，稱當盛世才把和加·尼牙孜的軍隊圍困在塔拉特山區時，在收取貴重禮物之後，把他放出了包圍圈。⁵⁶ 盛世才把新疆的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宣布督辦金樹仁被驅逐及離職的4月12日為「四月革命」之日，並開始宣揚自己是這場「革命」的關鍵人物。很快他就完全耍起了典型的中式手腕——起用垂暮老人李昉（音譯，此處原文有誤，據記載應為朱瑞墀——譯者註）取代任政府主席一職的劉文龍，自己隨之又輕而易舉地佔據了這個職位。⁵⁷ 從1933年6月12日起，盛世才已正式成為東突厥斯坦的主管總督（督辦）並緊緊掌握住各種權力。他任督辦的第一個動作是與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茲拉特金建

立關係。第一次見面，盛世才就盡力讓茲拉特金相信自己是「共產主義思想及與蘇聯友誼的擁護者」。⁵⁸

開始掌權的盛世才幾天後就宣布了自己著名的、帶有綱領性質的「六大政策」，包括反對帝國主義、發展與蘇聯友誼、提倡種族及民族平等、打擊專橫及賄賂行為、捍衛和平、建立新經濟（即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譯者註）等內容。同時根據政府綱要還確定了一些反映各種民族及民主改革措施的發展方向，其中包括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招工及工資發放中恪守民族平等，維護集會、言論及出版自由，取締前政府的不合法決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確保新疆經濟獨立對省內礦產資源進行勘探和開發，扶持農民，對外實行睦鄰政策，與中國中央政府共同建立涵蓋國民教育、教學在內的財政體系等。⁵⁹ 盛世才知道，要克服危機不能僅用改革手段及軍事措施。他計劃一方面開拓與蘇聯的關係，以獲取國外的支持；另一方面，與起義軍某些領導人單獨進行談判，讓他們轉向自己以分化起義運動陣營。1933年夏天，新任督辦首先與和加·尼牙孜談判，企圖讓起義的重要基礎——維吾爾人轉向自己。1933年7月，盛世才與他簽署協議，達到了讓維吾爾人停止針對政府部隊發動軍事行動的目的。根據協定，新疆南部將計劃建立維吾爾民族自治地區，確保各民族在政府中都有代表席位，並貫徹政府綱要中聲明的那些民主改革措施等。作為交換，為確保新疆的和平及安寧，和加·尼牙孜應與新疆政府合作且要聯合起來共同打擊馬仲英及伊寧張培元武裝。根據督辦的盤算，無論是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人，還是焉耆的蒙古人，很快就會附簽維吾爾人所簽的這份協議。⁶⁰ 然而，新疆的穆斯林運動在1933年秋卻進一步擴大了，儘管與和加·尼牙孜的協議稍許穩定了政府的局面，但並沒有完全結束維吾爾人的戰鬥。在與和加·尼牙孜會面的同時，盛世才也想與回民領袖馬仲英展開談判，並儘量借此機會製造回民和維吾爾人之間的不睦。但無論答應作出多大的讓步，與馬仲英的談判始終都沒有成功。⁶¹

維吾爾人起義的同時，準噶爾地區的回民在馬仲英的領導下，打着建立以奧斯曼王子阿卜杜·克里木為首的穆斯林國家的旗號也展開行動。儘管思想上的差異導致回民和維吾爾人之間產生了矛盾，但這種情況沒有長期持續。到1933年夏，以馬仲英為首的回民就聲稱他們一直都是穆斯林民族武裝的擁護者。馬的幾位顧問是土耳其人，他希望在中亞地區建立泛伊斯蘭國家。⁶²3月20日，部隊在上校帖木兒的領導下佔領了伊寧，3月25日攻取阿克蘇，4月25日拿下喀什。反抗中國行政當局的浪潮席捲了阿勒泰及塔爾巴哈台地區。6月13日阿卜杜拉將軍的隊伍又奪取了葉爾羌。

穆斯林武裝取得的勝利迫使新疆政府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在向莫斯科提出請求的時候，新疆政府想讓蘇聯領導人相信新疆發生的事件是由日本和英國操縱的。為了激怒莫斯科，盛世才寫道：「英、日帝國主義必然會利用這種局面，目的就是為了借助穆斯林民眾在新疆建立穆斯林國家來壓制蘇聯和中國的革命。」⁶³受這些請求的影響，政治局成立了以К·伏羅希洛夫為首、由Г·Я·索科爾尼科夫（時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譯者註）和Ш·З·艾利阿瓦（時任蘇聯副外貿人民委員——譯者註）組成的委員會，進一步詳細討論蘇聯在新疆的政策，以及商討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他有關機構撰寫的建議。⁶⁴7月，該委員會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他相關機構，共同就蘇聯在新疆政策問題起草了建議並轉呈政治局審核。這份文件由12條內容組成，認為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並不適宜，要向烏魯木齊政府提供幫助，並要強化蘇聯機構中的工作紀律。在共同會商的建議書，還建議在英、日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那些地區成立地方自治機關。文件的第三條寫道：「首先必須做的事是向烏魯木齊政府提供積極幫助以擊潰馬仲英及回族部隊，這些人是將新疆變成反蘇活動基地之計劃的現實基礎。」⁶⁵8月3日，政治局討論了委員會起草的建議，並對新疆工作作出指示。委員會起草的建議沒有作任何修改，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通過的決議涵蓋蘇聯在新疆